



杏落了

文/航笛

乡愁·永川

又到了杏子成熟的季节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老家村口那棵杏树，还有那些散落在杏树下的快乐时光。

曾几何时，杏树是奶奶心疼的“宝贝”。

奶奶结婚那年，爷爷从邻村带回来一株尺把高的杏树苗，随手在村口大路边上的乱石堆里给它刨了一个窝，然后盖上些土，浇了些水。虽然栽得有些马虎，但杏树苗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只是孤零零的立在那里，有些瘦小和单薄。

看着乱石堆的杏树苗，奶奶有些心疼，本想把它移栽到屋后厚实的地里，但又担心挪窝会伤其“筋骨”，于是经常过去给它培土、为它施肥、陪它说话。杏树像是读懂了奶奶的爱怜，一路野蛮生长：起初树干微微朝着路边倾斜，等离地一米多高后就直立向上，像极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，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。

成长中，杏树成了全村的地标。

到我懵懂记事的时候，杏树伸展的枝桠遮住了路边的水田，足足投下了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阴凉。树上，是鸟雀筑巢落户的安乐窝；树下，是村民歇气聊天的休息地，而离地不到两米的树杈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练习攀爬的训练场。

杏树下的大路，是大家赶集的必经之路，每个人路过这里，都忍不住抬头仰望这头顶上的一片绿；或者干脆就在树下的石头边上坐下来，享受这惬意的清凉；甚至大家邀约一起出门，都会不约而同地说“杏树下等你”。

长大后，杏树结满了我们酸酸甜甜的记忆。

经过初春的晾晒，到了三四月份，杏树开始挂果了，那些最初只有小指头大小的青果，由细变圆，静静躲在杏树叶后，和满树翠绿浑然一体，即使我们瞪大眼睛，也未必能寻见到它们的踪影。

杏子由小到大，由嫩青变浅黄，悄无声息从树叶间显露出来，风吹过后，它们还自个儿在树上得意地晃悠几下，惹得我们一地口水。

“杏~落，杏~落”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们都会望着杏子喊起来。

奶奶闻声跟了过来，一双小脚把杏树漏下来的阳光踩得稀碎，乐呵呵地安慰我们说：“不急不急，这个时候杏儿要把你牙巴都酸落！”

杏子本是稳稳地站在树梢，但再经过一段阳光的照晒，杏皮的黄就由浅变深，然后满身挂满藏不住的金黄。

“杏~落，杏~落”，望着满树的杏子，我们齐声喊得更起劲了。

奶奶又闻声赶过去，边走边跟着我们一起加油：“杏~落，杏~落……”

总有一些性急的杏子探出头来，如同高台跳水的运动员一头扎进树下的秧苗丛中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细响。胆儿大的伙伴争先恐后地跳进秧田，顺着落声的方向扑上去，小手在水田里哗啦哗啦地摸了起来。

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伙伴把沾满稀泥的杏子高高举起，手里和眼里都是藏不住的骄傲。

树下的秧苗被伙伴们踩得东倒西歪，但奶奶非但不气恼，反而给大家递过来一根长长的竹竿，“来来来，杏熟了，再打一些下来。”

“啪啪……破破……”那些直直掉在地上的杏子，身子被摔裂出一道口子；而另一些顺势扎进水田的杏子，又赢得田里的伙伴们一阵欢呼。

“我摸到了一个……”“我也摸到了一个……”

等到杏子完全成熟的时候，爷爷会找来木楼梯、带上长竹竿，拿上篾竹篓，攀爬上树采摘，然后把刚摘下的杏子塞满我们的口袋。

大家蹦蹦跳跳地走在回家路上，一个个像是打靶归来的战士。

再后来，杏树成了我们一生的挂念。

我们长大上学、务工安家，杏树下每年的热闹慢慢变淡了，最后剩下奶奶一人站在树下，等待杏树开花，静候杏子成熟，守望树下再见。少了树下的欢笑，曾经挺拔青翠的杏树也有些疲惫憔悴，曾经枝叶繁茂的杏树脱落成光秃秃的树干。

奶奶去世那年，稳稳站了几十年的杏树轰然倒下，倒进了路旁的水田，倒进了我们每个思乡人的梦里。

“杏落，杏落……”曾经，这是满眼的守候，满心的欢喜，而今再忆起，却是满满的心酸，还有感念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归云岭

文/贺小蓉

乡愁·云阳

渝东北的许多山没有名字。

从云阳往高阳走五十公里，车子像甲虫在一重重褶皱里绕行。山的尽头是望不见的。

我要说的这座山，《云阳县志》仅载一句：“高岭矗起，曰陈家山，山势开拓……”它没有词条，没有典故，在任何名山录里都找不到。

但在我们那儿，比山更出名的是它的一段。站在皇城村抬头北望，能看见山脉最高处隆起的脊背——先是红砖白墙，再是绕山的农田，然后是杂木林，到顶上只剩青灰岩石和一围老墙。

那老墙是条石垒的，深褐色，缝里长满苔藓，厚实得顶上还能走人。老人们说是古时打仗或防土匪的，谁也说不清。只有石头日复一日沉默着。

因为那老墙，这山峰有了名字——大寨子。方圆十几里，一说便知。

从老墙绕过去几十步，是一处断崖。站在崖边往下看，村庄缩在褶皱里，冬水田亮晃晃的；平视出去，山后面还是山，一层淡似一层，最远的已和云分不清。渝东北的山不雄伟，只是多，多到让人觉着走出去很难。

崖顶看云时，会想起不远处叫“云爬梁”的地方——云爬过山梁。我取一个“云”字，把脚下这片平地唤作归云岭。

云归山岭，人也归乡。云是飘忽的，山永远在这里等。

二

我对大寨子最初的记忆，是在母亲背上。

那年我四五岁，租住在皇城村。母亲背着弟弟，牵着我，从公路走到山林，穿过水田，到老房子拿锄头和镰刀。推开木门，门轴吱呀作响。她从墙角翻出工具，拂去灰和蛛网。最后把我们带到老墙底下几百米处的一块坡地——我们的地，荒了很多年，土硬得像石头。

母亲弯腰开荒，锄头举过头顶，落下去，咚的一声闷响。

我坐在地边石坎上摘野谷子吃，剥开壳，嚼碎白生生的米粒。有时稻壳刮过喉咙，粗粝粝的，也不停手。整面山坡安安静静，只有锄头声荡开，又被老墙挡回来，变成含混的回音。

那时我不知道，这片山坡下已经埋了很多。

后来每年腊月二十几，父亲带我们来挂坟。他拎锄头，我们拿簸箕，从一座坟走到另一座，从山腰走到山顶。他蹲下来割净杂草，培上新土，挂上坟纸，点香，青烟笔直地升到大寨子老墙那么高才散。我们跪成一排磕头。父亲一个一个指给我们：爷爷、奶奶、二伯、大奶奶……这张图上没有路，只有一代一代人最后停留的地方。

后来母亲也埋在了那里。

她从很远的地方嫁来，在这座山脚下生活了十年，三十岁病故。那年我还没有灶台高。关于她，我知道的很少，只记得她牵着我上山开荒的背影，和锄头落进土里的声音。

从那以后，大寨子对我，不只是一座山了。

三

大年初一登高祈福，是许多地方都有的习俗。

小时候，吃过拳头大的汤圆，穿上床头放了好几天的新衣，母亲给我扎两个马尾辫，戴上红头花，一家人就出发了。

往大寨子去的路上，人很多。附近村子的老老少少都来了，嗑着瓜子，互相打招呼。你给我一把花生，我给你几颗糖，站在路边聊这一年在哪儿打工、收成怎样。谁家娶了新媳妇、谁家添了孙子。路窄，只能一前一后走，小孩子冲到前面，双手撑着膝盖喘粗气，拖着长音喊：搞快点哦。大人们不慌不忙，故意慢吞吞地走，好多说几句话。

那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爬这么高的山，就为了上去站一站。

后来在重庆过年。城里的年什么都不缺，就是心里空落落的。父亲总念叨要回去。有一年我陪他回了。大年初一，他拎着塑料袋装的坟纸，我跟在后面，沿着修了水泥的路往上走。

大寨子变了。小时候费尽力气才能爬上去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。我们曾耕种过的坡地被承包出去，全种了李子树。春天开花时，整面坡白得像下了一场薄雪，叫“高山青脆李”，听说卖得很好。

有些东西没变。山顶上还是那么多人，站在老墙上，站在归云岭崖边，往下看，往远处看。看几分钟，说几句话，转身下山。

这一年一回的仪式，从前我不懂，现在懂了。那不是看风景，是对新一年的期望，也是对埋在这片向阳坡地的亲人说：又过了一年。我们还在。孩子们又长高了。在外面的人回来了。

四

仔细想来，我从未一个人上过大寨子。

每次回去，总是和家人一起。一靠近那座山，尤其是走到老墙底下，心便提起来。不是因为那些鬼怪传说——古战场的冤魂、夜间的影，我都听过，却并不为此。

是一种更沉的东西。像是整座山在注视我。

我知道土里埋着谁，知道坟纸下是谁的名字，知道母亲在哪棵李子树旁。山太满了，满到一靠近，脚步就轻了。怕的不是他们，是站在那里，想起太多。

可每年还是上去。站在归云岭崖边，往下看——皇城村还在，田地已成李子园，土路成了水泥路，但山的形状未变。远处那一重又一重，仍无尽头。

云从谷底升起来，漫过苍老的城墙，漫过李子树，漫过坟头，像被什么召唤，往山顶聚拢，停在归云岭。

云归山岭，人也归乡。

这座史书上几乎没有名字的山，收纳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。活着时在山坡耕种，死后就睡进山的身体里。

山不言语，但每年大年初一，都在等人。

（作者单位：涪陵区人民法院）